

全球大变局下的中东与美国

GLOBAL GREAT TRANSFORMATION:
MIDDLE EAST AND U.S.

高祖贵·著

U.S.
MIDDLE EAST

本书从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变动的高度，全面系统深入研究2010年以来中东大变局的进展、影响因素、地区格局效应，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相应政策，以及这些变化对亚太格局和中国—中东关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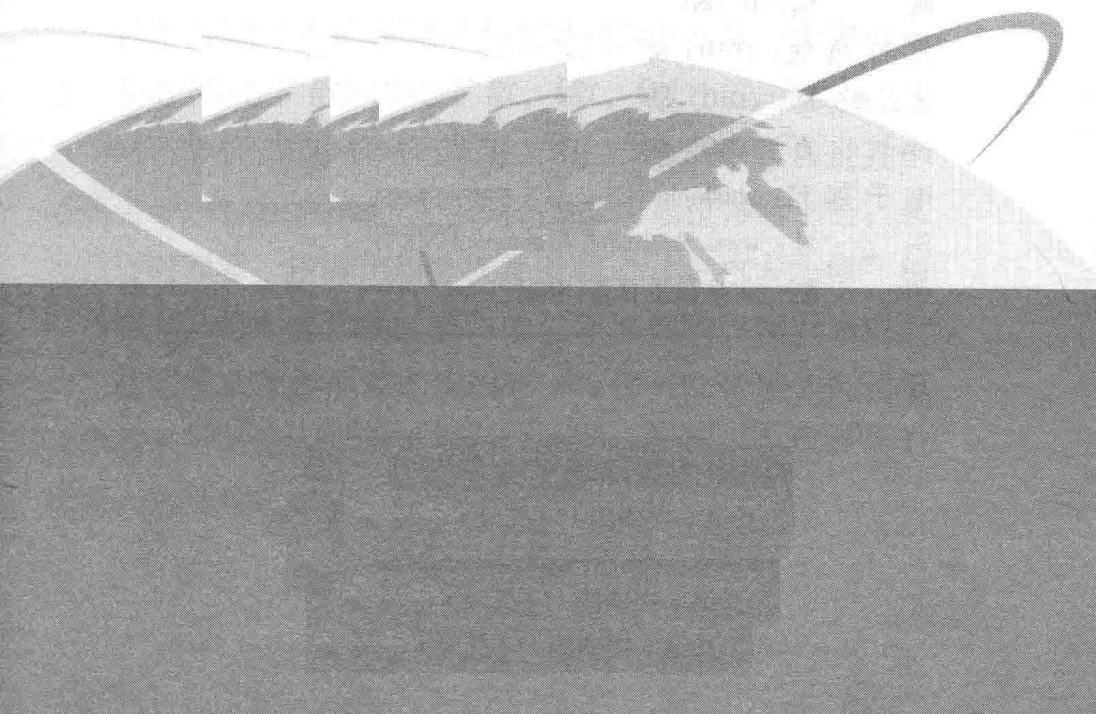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全球大变局下的中东与美国

GLOBAL GREAT TRANSFORMATION:
MIDDLE EAST AND U.S.

高祖贵·著

U.S.
MIDDLE EAS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大变局下的中东与美国/高祖贵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195-0096-2

I. ①全… II. ①高…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中东
问题—研究 IV. ①D871.20②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77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22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在延续诸多规律性变动的同时，由于人口结构、技术创新、生产方式、信息传播方式、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快速变化，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深入解构和建构作用，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特点和新形态。

一、美欧整体下沉趋势凸显，推动多极化 向全新的广度和深度扩展

世界多极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力量中心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扩散，以及各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缩小。从百年时段来看，多极化趋势就是近代以来欧美作为世界中心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亚非拉地区的地位持续上升；从冷战后时段看，多极化趋势就是美国“一超独大地位”相对削弱，其他大国及地区强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从近年来世界形势的发展看，不仅美欧整体下沉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美国自身的唯一霸权地位也在相对减弱。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变动。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欧美向全球扩张并逐步确立主导地位。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欧更是借助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凭借强大的资本和军事力量，将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整套思想、制度及其实践全方位推广，使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势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态势被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① 在美洲，美国推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利用20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全面推广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洲，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不断推进，甚至一度要把环地中海周边地区也整合进来。在全球，美欧摇举着保护人权的旗帜，利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个平台批评指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发展，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大肆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与此同时，美欧文化也裹挟着一股强势向全球广泛传播。在此进程中，世界的动荡和混乱主要集中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西方在亚非拉地区所制造的种种危机。

然而，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欧洲的债务危机。从那时到现在，美欧不仅还没有完全摆脱金融危机，而且由此激发和催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问题不断发酵和持续累积，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给美欧内部的发展和治理构成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的衍生和发展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 4.

同美欧长期奉行的价值观、制度设计、道路选择紧密相关，具有比较明显的系统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改变，除非进行比较全面彻底的变革。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尽管是管窥之孔，却已充分体现出问题所在之深刻、克服挑战之艰难、冲击世界之严重。2017年，这一趋势将在英国“脱欧”的谈判和欧洲多国的政局变动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施政中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来，对世界造成更大范围更加深刻的系列冲击。这就使得长期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美欧的自身发展和稳定问题日益成为加重当今世界失序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最重要因素，其消极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将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这已成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变革调整大势的一个重要视角。

1. 从经济发展态势看，2008年以来，美欧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紧缩性财政政策等，不断刺激经济增长，确实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美、英、德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甚至从2014年以来就都实现了1%以上的增长。但是，总体看，美欧经济整体下沉的态势不仅没有因为经济增速有所提高而发生逆转，相反近年来却在政府债务负担持续加重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呈现进一步加剧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西方七国”（G7，美、加、英、法、德、意、日）从2007年到2015年底，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54.82%下降为

46.38%；预计2016年和2017年，这个比例将分别进一步下降到45.62%和44.87%。^①

其中，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要代表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一超”的总体地位依旧突出，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7.947万亿美元、18.234万亿美元、18.635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2.6%、1.6%、2.2%。^②但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权重却在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加以计算，从2006年到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将从27.13%下降为23.8%。^③政府债务则大幅攀升，截至2016财年末9月结束时，已经达到19.5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6%；2016年底预计将突破20万亿美元。在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虽然就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而言绝对经济总量大都不断提高，但就横向比较而言各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同样在持续下降。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2006年到2017年期间，同样分别从5.07%下降到3.66%、从4.55%下降到2.39%、从5.88%下降到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6, IMF, October 2016,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pdf/text.pdf>.

②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6, IMF, October 2016,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pdf/text.pdf>.

③ 这些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得来。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4.32%、从8.53%下降到5.12%。^①

这种经济发展态势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等领导人在美英实行并向全世界推广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存在明显弊端,正在经受严重挫折,急需调整。金融危机以来美欧一直力图寻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增长模式,但至今仍未找到,依然在探索之中。这也就是说,美欧还是没能从经济政策乃至制度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囿于制度局限而无法加以推行。美欧在经历19世纪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1.0版”、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2.0版”、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3.0版”之后,能否如其思想家和政要所期待的那样转型升级为“更加温和、更加注重公平的资本主义4.0版”,^②这仍然是他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态势下,美欧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绪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对外援助不断减少,正在从过去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供给方演变成如今的阻碍者和需求方,对世界发展的消极影响持续增大。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对世界的发展进步发挥积极的再平衡作用。

① 这些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得来。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② 周荣国:“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内部争论和未来走势”,载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第31页。

2. 在经济发展整体态势持续下沉的影响下，美欧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多重矛盾相互交织联动并呈日益加重之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全球化进程中，美欧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追逐最大利润，导致产业大批外移到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剧了美欧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同时，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美欧发动战争打乱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大批涌入的外来移民，与当地民众在就业方面形成竞争，客观上拉低了美欧中下层民众的就业薪酬。此外，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在美欧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推广应用，又替代了越来越多中低收入者的就业。例如，在美国，无人驾驶汽车日益广泛的应用，将直接威胁 300 多万职业卡车司机的工作机会；约有 1700—2000 万墨西哥移民的存在直接挤压美国本土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男子就业机会。尽管美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从 10% 左右持续下降到 5% 以下，但放弃再就业的中年人尤其是白人的人数却不断增加，这使得实际上的失业率依然较高。“到 2015 年，美国年龄在 25—54 岁、没有寻求工作的男性公民所占比重达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① 这些因素加上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乏力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美欧内部的失业问题难有明显好转。

其次，与上述变化趋势紧密相关，金融和制造业资本

^① *Global Trends: Paradox of Progress*,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January 2017, <https://www.dn.ic.gov/files/images/globalTrends/documents/GT-Full-Report.pdf>, p. 32.

家群体所代表的富有阶层作为全球化进程的“赢者”，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导致财富持续快速增长。而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作为全球化进程的“输者”，则由于就业竞争力下降和机会流失而导致财富持续缩水。这“一升一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重，中产阶级的规模持续萎缩，美欧社会原有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向中下层规模持续扩大的金字塔形转变。而且广大中下层民众靠自身努力跻身中上层的社会流动性持续减弱，“美国梦”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又以美国为例，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国家庭总财富的40%左右。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就任前所表示的把企业税率从30%降至15%的计划得以实施，那将使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税后收入增加1.8%、平均提高1010美元，使占美国人口0.1%的收入最高的小群体税后收入提高14%、平均获得近110万美元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可能在特朗普新政下进一步加剧而非缩小。据麦肯锡公司估计，2014年发达国家2/3家庭的实际收入处于或低于2005年的水平。^① 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特朗普当选不仅没有缩小美国内部多层面和多领域的分裂，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些裂隙和激化各种矛盾。

再次，本国民众与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此消彼长引发

^① *Global Trends: Paradox of Progress*,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January 2017, <https://www.dn.ic.gov/files/images/globalTrends/documents/GT-Full-Report.pdf>, p. 12.

忧虑，增大外来移民融合难度，激化安全矛盾。美欧原本就长期存在大批外来移民。金融危机后，在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机会总体下降的背景下，外来移民就业所受排挤和被边缘化加重，与当地社会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程度明显下降。这种趋势在又一组“一升一降”（即美欧社会长期存在的白人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白人人口相对数量持续下降，以及外来移民人口增长尤其是 2014 以来新一轮难民移民大规模涌入导致包括穆斯林在内的非白人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快速凸显出来。以美欧白人与穆斯林的对比为例，根据美国皮尤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2013 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已达到 5638 万，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 7%，其中法国、英国、德国的穆斯林人口数量分别为 642 万、280 万、305 万，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0%、4.8%、3.7%。^①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使得美欧本土白人与外来各种有色族裔移民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价值文化的碰撞、身份认同的纠结、政治认同的分裂等愈加凸显。在外来移民和难民制造的暴恐袭击和刑事犯罪明显上升的催化作用下，这一系列裂隙所引发的现实和潜在安全风险变得越发突出，激发和助推美欧社会本国民众的排外主义、反移民思潮，甚至开始出现极端化苗头。美欧曾经呈现和极力标榜的自由、开放、多元、包容、融合的气象开始显著减退。

^①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2010 - 2050*, http://www.pewforum.org/files/2015/03/PF_15.04.02_ProjectionsFullReport.pdf.

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为美欧极右思潮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混杂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反一体化、白人至上等因素的思潮快速泛起，使得公众对精英和政府的失望、不满和不信任程度持续上升，年轻人对言论自由等的支持度低于他们的前辈，西方民主制度的声誉和影响不断下降。根据美国《民主杂志》所刊文章提供的数据，美国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千禧一代”，1/4的人认为民主制度是治理国家的“糟糕”或“非常糟糕”的方式，26%的人认为领导人以自有选举方式产生“并不重要”，43%的人认为军队可以在政府治国不力的情况下接管政权；美国富有人群中，35%的人认为军队可以在民主制度失败时接管政府，32%的人更喜欢强硬的领导人。^① 根据盖洛普的民调显示，1982年认可社会主义的美国人只有20%，2015年表示会投票给“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参选人的美国人则高达47%。^② 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率已经从2002年的64%直线下降到2008年的26%，并继续下降到2012年的21%。^③ 如今，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下降到1958年有这个衡量标准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因素正在共同重塑着美欧国家的政治生态。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

① Robert Stefan Foa and Yascha Mounk, "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 *Journal of Democracy*, July 2016, Volume 27, Number 3.

② 周荣国：“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内部争论和未来走势”，载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第32页。

③ 谢韬：“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衰败”，载于《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第37页。

动”等极右翼党派影响不断上升、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德国纳粹思想明显抬头等事态，其实都是这种政治生态深刻变化的反映和结果。

这种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美欧政府把注意力进一步集中于解决内部的经济增长迟缓、财政压力增大、政府债务增加、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障需求持续扩大、社会政治对立激化等诸多难题上，呈现自顾不暇之态。他们的发展战略更加聚焦国内而势必减少对全球事务的资源投入，在全球事务中的姿态的整体“内向”趋势将变得更加突出，长期主导的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可能明显受挫，国际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全球霸权地位可能进一步下降。

3. 相比之下，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比较快速的群体性的梯次崛起态势。其中，“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经济发展虽不同程度地面临困难，但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从2007年到2015年底，五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79%增长为22.28%；预计2016年和2017年，这个比例将分别进一步上升为22.68%和23.09%。^①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协调，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峰会、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多边框架下的作用持续增大。特别是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6, IMF, October 2016,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pdf/text.pdf>.

“金砖五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0 年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在 2016 年 10 月使该方案生效；在 2013 年 4 月南非德班峰会上决定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在 2014 年巴西峰会上确定有关实施方案，在 2015 年 6 月中国上海正式挂牌成立，这对现有国际多边开发融资体系构成补充和推动。同时，俄罗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在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伊核、朝核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此外，随着东盟、非盟、阿盟、拉美共同体等地区框架下的合作推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国际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提升。在美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消长作用下，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态势明显改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与中俄欧等“多强”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全球力量对比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平衡，这正是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效果体现。

二、主要力量重新厘清内外战略

面对日显动荡多变的世界尤其是不断深化的多极化趋势，世界主要战略力量越发紧迫地调整内外战略，努力明确定位和优势劣势，力图在未来出现的多极格局中谋求比

较有利的国际地位。

1. 美国维护霸权的战略在总统更替中既延续又变化。国内多重矛盾加剧并增大治理困难，加上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趋于激烈，“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持续发展，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地区热点和难点局势均不同程度地面临新形势，全球性挑战仍在上升，国际多边组织在全球治理需求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改革创新压力增大。俄罗斯、南非、布隆迪、冈比亚四国相继宣布退出美欧主导的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表达类似意愿，诸如此类的因素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酝酿更加深刻的变动。这一系列挑战使美国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能力和决心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弱。

然而，应该清醒地看到，即使如此，美国不仅不会轻易放弃世界主导地位，相反正在加快调整内外战略，充分发挥优势，以防止地位进一步下滑，甚至卷土重来。在此进程中，美国对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发展稳定但自身要付出较高成本代价的对外政策努力可能变得越来越勉强犹豫，对捞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则会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它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的积极作用减小，负面影响甚至是问题和麻烦则可能进一步增大增多。

从奥巴马治下的8年到接下来的特朗普治下时期，美国维护霸权的战略在总统更替中将既延续又调整，甚至内

在延续性超过变动性。从执政大背景看，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是在美国国内矛盾明显上升，而国际超强地位相对下降的形势下施政。从执政总体目标看，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在国情咨文中高喊的“决不当世界第二”和“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的口号，还是特朗普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高举的“美国再度强大”和“美国第一”的旗号，他们都是在设法解决前述美国面临的各種发展难题，极力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这就决定了他们都将把国内治理作为最优先的事项。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金融、教育、科技、医疗、移民等一系列改革，力图实施“再工业化”计划来促使美国外海企业回归，推进能源自给计划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经济竞争力，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以维护中产阶级利益。特朗普政府力图通过大幅减税和增加补贴等措施来促使制造业回归和提升企业竞争力，谋求放松国内化石能源开发限制，更大规模地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增加中产阶级就业和中下层民众福利保障，等等。他们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少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的看法以及具体政策选择存在差异，但政策目标甚至思路却有很多共同点。从对外战略整体态势看，由于美国利益的全球性存在，维护全球霸权地位本身就是实现“美国再度伟大”和“美国第一”目标的重要保障，这就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要力图继续掌握美国对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转换的战略主动权。基于同样的逻辑，由于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把国内治理放到最优先位置，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

对外战略上都将采取总体收缩的姿态。

在国际经贸领域，奥巴马政府与 23 个经济体（共 50 个国家）开启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全面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谈判，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智利、墨西哥、秘鲁等 11 个国家谈判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力图主导制定新的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特朗普政府在竞选期间尖锐批评尚未结束谈判的“跨大西洋全面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谈判，招致欧盟贸易委员回应表示停止谈判；就职之后不久就宣布或签署行政命令，要重新谈判或退出已经加入生效的北美自贸区协议（NAFTA）、“退出”已经结束谈判但尚未批准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转而表示更愿意寻求做出双边经贸合作安排。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外经贸战略和策略不同，却都是为了使美国占据比较有利的经贸竞争地位和获取更多经贸利益。在政治外交领域，奥巴马政府强调使用尽可能少的成本来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注重借助同盟和伙伴的作用，在地区战略中更多采用“离岸平衡”和借力打力策略，在地缘战略部署上把亚太作为重点并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策策略使用上对打压对象更多使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多边施压等。特朗普政府表示要帮助盟友伙伴提升能力，促使盟友分担更多安全保护费用，寻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尤其是加强反恐合作，增加对巴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等中东局势的关注。